



刘培华

近代中外关系史

下 册

近代中外关系史

下 册

刘 培 华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181203

G7A100/11

近代中外关系史

下 册

刘培华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25印张 396千字

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7,000册

统一书号：3209.16 定价：2.75元

目 录

第六章 甲午战争以后五年间的中外关系	(1)
第一节 帝国主义开始进一步对中国的大肆掠夺.....	(4)
第二节 德国强租胶州湾和英俄争夺对清朝政府控制权的斗争.....	(34)
第三节 列强侵夺中国沿海港湾的高潮和清朝政府的全面妥协.....	(62)
第四节 列强在华争夺铁路投资范围 和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81)
第七章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中外关系	(105)
第一节 清朝政府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同帝国主义的勾结和矛盾.....	(107)
第二节 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侵略和清朝政府的两面政策.....	(128)
第三节 列强瓜分中国阴谋的破产和《辛丑和约》的签订.....	(149)
第四节 中俄关于交收东三省的交涉.....	(168)
第八章 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外关系	(186)
第一节 列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日俄战争.....	(188)
第二节 日本、沙俄大肆掠夺中国东北利权和清朝政府同日俄的交涉.....	(207)
第三节 美日争夺中国东北的斗争和清朝政府的“联美”政策.....	(230)
第四节 英俄侵略西藏的暴行和中英关于西藏、片马问题的交涉.....	(255)

第九章 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的中外关系	(293)
第一节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对外政策和列强对辛亥革命的干涉	(295)
第二节 帝国主义乘机勒索侵华权益和阴谋分裂蒙藏及侵略新疆的罪行	(326)
第三节 日本乘世界大战爆发之机疯狂侵华和列强对袁世凯帝制活动的干预	(365)
第四节 美日在华的角逐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中苏关系	(399)
附录一 大事年表	(451)
附录二 中国驻英、俄、美、法、德、日六国公使表	(474)
附录三 英、俄、美、法、德、日六国驻华公使表	(477)

第六章 甲午战争以后五年 间的中外关系

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一些西方先进国家，即已进入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新的历史阶段。而这一过渡，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际，已经基本完成，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对于国家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也已代替商品输出而居于重要地位。这样一来，帝国主义国家谋取海外扩张、争夺殖民地的要求也就更加迫切了。因为“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障垄断组织获得胜利，战胜同竞争者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直到战胜敌方打算用国家垄断法来实行自卫这样的意外事件”^①。

但在这时，世界上的所谓“无主土地”已被帝国主义列强分割完毕，剩下来的只有一些未被完全征服的半殖民地国家，如中国、土耳其、波斯等。因而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些地区的争夺，表现得特别尖锐和激烈。恰值此时，中国为一个新兴的东方小国日本所战败。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覆没和湘淮陆军的一触即溃，使清王朝的腐败和虚弱暴露无遗。这就使中国首先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和鲸吞的主要目标。

由于世界上的所谓“无主土地”已被分割完毕，所以帝国主义列强除了竭力争夺有限的一些半殖民地国家之外，要求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也已开始逐步展开。原来，在殖民国家第一次分割世界的过程中，各个列强所掠得的殖民地领土相差异常悬殊。“例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见《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2页。

如拿面积和人口都相差不远的法、德、日三国来比较，就可以看出，法国的殖民地（按面积来说）几乎等于德日两国殖民地总和的三倍。”^①这就造成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相互矛盾。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进一步加剧，使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三十年间，列强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出现了巨大变化。英、法两国在此以前的原有优势逐渐消失，而新起勃兴的美国和德国日益取得领先地位。这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不平衡性引起的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对殖民地的原有分割现实，处于极其难以为继的状态。于是，帝国主义各国之间要求重新分割世界殖民地的斗争日趋激化。

为了重新分割世界，在欧洲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逐渐形成了相互对立的军事集团。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德、奥、意三国同盟首先成立；接着，法国与沙俄的同盟也在九十年代初期出现了。但在这时，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强大的英国，尚暂处于两个集团之外。它企图利用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寻找有利时机，纵横捭阖，借以保持自己业已取得的世界霸权地位。

当时，对于英国世界霸权地位的主要威胁是沙俄和法国。早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沙俄就在中近东的伊朗、阿富汗、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同英国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在远东的中国，沙俄也为同英国争夺对华北和西藏的控制权而一直彼此相持不下。法国为了夺取印度支那半岛和北非的殖民权益，同英国的矛盾斗争亦很尖锐。在一八九三年和一八九八年，英法两国由于争夺暹罗（今泰国）和埃及，彼此之间曾经两度出现武装冲突的危机。法国为了排斥英国在中国西南一带的殖民势力，谋夺独占云南和两广的侵略特权，它同英国在华的斗争也十分激烈。因而，在十九世纪末期，英国政府在国际活动中，采取了倾向德、奥、意三国集团的政策。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见《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1页。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内部情况，也有了新的重要发展。由于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败北，以及清朝政府的最后屈膝投降，宣告了所谓“中兴”神话的全部破产。这样一来，就更加彻底地暴露了清朝政府的反动和腐败，并进一步揭穿了它在对外关系上卖国求存的丑恶嘴脸。所有这些情况，不仅激起了中国广大人民对于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阶级的极端痛恨，同时也激发了他们极大的爱国义愤。于是，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清朝反动统治的革命情绪，迅速趋于高涨，各地群众的反清起义和反洋教斗争，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兴起。

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要求急起图强和进行变革的呼声，在上层社会中也有强烈的反响。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良派，在甲午战争结束时的“公车上书”中，即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嗣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他们在上海、湖南、广东等地广泛开展活动，并于一八九八年发展成为自上而下的戊戌维新运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在海外组织力量，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一八九四年“兴中会”的成立，以及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标志着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就在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又发动了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它们纷纷在华夺取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从而造成了中国民族的空前严重危机。列宁在论及当时中国的危急形势时说：在甲午战争之后，“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拚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瓜分中国的议论并不是无的放矢。如果直言不讳，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①。在这种极端险恶的形势面前，清朝政府不思励精图治，谋求振兴，借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而仍为维护其反动统治的利益，继续执行对外妥协退让的卖国政策。清朝统治者的这种罪恶

^① 列宁：《中国的战争》。见《列宁全集》第四卷，第335页。

行径，为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侵夺中国权益开了方便之门。

第一节 帝国主义开始进一步 对中国的大肆掠夺

一、《四厘借款合同》和中法续议 商务、界务专条附章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活动，以沙俄和法国索取“干涉还辽”报酬而肇端，其中沙皇俄国“最先伸出魔掌”^①。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沙俄的资本主义工业出现了新的高涨，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人数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六，工业生产总值更增长了一倍，并且已在铁钉制造、铁丝制造，以及制糖、石油等行业中，陆续形成了一批辛迪加垄断组织。同英、美、法、德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沙皇俄国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虽较薄弱，但它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比较强大的”^②。它凭借“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权”，利用与中国接壤的便利条件，“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财政资本的垄断”。^③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幻想利用俄国在这方面的优势及清朝政府进一步对外奉行妥协投降政策所提供的有利机会，建立一个庞大的“俄罗斯——中华帝国”。为了逐步实现这一狂妄计划，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亚历山大三世派皇太子尼古拉

① 列宁：《中国的战争》。见《列宁全集》第四卷，第335页。

②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204页注。

③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14页。

(他于一八九四年继承皇位，即尼古拉二世)到香港、汉口、九江、上海等重要城市进行“旅行”考察。他在中国活动了二十多天，同两广总督李瀚章、湖广总督张之洞等高级地方官吏进行了接触。一八九五年沙俄发动的“干涉还辽”活动，实际上就是上述计划的组成部分。

它的“干涉还辽”的真实意图，就是拟借此增强它对清朝政府的政治影响，抵制和排斥英国的在华势力，从而确立沙俄在中国的霸权地位。若用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R. Robanov)的话来说则为：俄国所以“为中国效劳”，主要的就是要“使中国处于依赖我们(沙俄)的状态，而不让英国扩大它在中国的影响”。^①

《马关条约》刚一签订，沙皇政府便立即开始攫取在华利权的侵略活动，它所做的第一件事，乃是争夺对中国的贷款权。

在甲午战争以前的三十多年间，清朝政府一共借过二十五次外债。这些贷款，大半是由地方政府出面，借自外国银行(绝大多数是英国银行)，每次款数不大，总额仅银四千一百多万两，且在战前都已还清。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对清朝政府的贷款，不但数目之大为前此所不能比，而且具有显著的政治奴役性质。

按照《马关条约》和《辽南条约》的规定，清朝政府须偿付第一期对日赔款八千万两(战争赔款五千万两，赎辽费三千万两)。但当时清朝政府根本无力偿付这笔巨款，必须大借外债。于是，帝国主义列强就乘机争相要求提供带有政治条件的贷款。起初，清朝政府拟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向英国汇丰银行举债。沙俄闻讯，急起争夺。一八九五年五月三日，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对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表示：英国拒不参加对日干涉，中国反而同它接洽借款，使他感到甚为“诧异”，并且声称俄国财政部已经拟定了“有益中国”的贷款办法，中国应该“先商俄国，方见

① 转引自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译本，第176页。

交谊”。^①与此同时，德、法两国亦相继向清朝政府接洽贷款，争逐利权。当时，日本对于三国干涉还辽问题，尚未作最后答复，清朝政府对俄、法、德寄望正殷，不敢开罪三国，致生枝节。于是，清朝政府决定暂且不向英国举债，而分别与俄、法、德三国商借。沙俄执意不肯，力图独揽这笔交易。罗拔诺夫向许景澄表示：“俄法一气，无庸虑；德国一边，可另想法。”^②并且他还蛮横地进行威胁说：“分办不如勿借。”^③其势咄咄逼人。清朝政府被迫，只得对俄屈从。

但在当时，沙俄国库的现金储备不足，无力单独提供这笔巨额贷款，因而最后不得不联合法国共同承借。德国因被排斥在外，故对沙俄极表不满。于是，它就联合英国，倡议由各国共同对华提供借款。但是英、德的活动没有成功。这种情势使英国颇为失望。赫德深有感触地说，因为俄国“为中国帮了这样的大忙，已使中国人的眼睛再也看不到别的，英国人只好远远地退处下风”^④。英国公使欧格讷也不禁为之慨叹道：“王牌都在别人手里，我们只得打长算盘了。”^⑤

一八九五年七月六日（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四日），清朝政府的代表许景澄在俄京圣彼得堡正式和“俄国各银号商董”签订了《四厘借款合同》^⑥。根据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法银虚

① 许景澄：《致总署报俄欲贷我款偿日费电》（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见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一百一十一卷，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刊本，第11页。

② 许景澄：《致总署罗拔诺夫言请借一万万万结辽事电》（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一日）。见《清季外交史料》第一百一十三卷，第1页。

③ 许景澄：《致总署报法俄方睦俄款可借电》（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见《清季外交史料》第一百一十三卷，第2页。

④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3—174页。

⑤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4页。

⑥ 《四厘借款合同》（1895年7月6日），一般也叫“俄法洋款”，共十九条。全文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6—629页。

数四万万法郎”（折合白银约一万万两）（第一条）；由六家法国银行和四家俄国银行，按照“九四又八分之一折扣，用法银照付此借款”（第十一条）；“照金本虚数周年四厘行息”（第四条）；中国自一八九六年三月起，“分为三十六年清还”（第四条）；借款“以中国海关所入税项及存票作为押保”（第九条）。在正式借款合同之外，还有一个《四厘借款声明文件》，其中另有两项重要规定：第一，俄国政府对签订借款合同之银团负责，如到期中国政府不能偿还应付本息，可由俄国政府负责垫付，“惟中国国家应另许俄国以别项进款加保”（第三条）。^① 这项规定的目的，是要迫使清朝政府处于“依赖”沙俄的地位。第二，“中国声明，无论何国何故，决不许其办理照看税入等项权利。如中国经允他国此种权利，亦准俄国均沾”（第四条）。^② 这项规定反映了沙皇政府有通过此次借款，抵制英国垄断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的意图。

《四厘借款合同》的签订，对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侵华权益及中国的政治、经济都有极大影响。就列强在华的相互关系来说，它是俄法同盟向英国在华侵略优势的挑战，这不仅显示了俄法集团在华侵略势力的增长，同时也反映出英、俄争夺在华霸权斗争的日趋尖锐。就对外关系来说，这是沙俄勾结法国共同侵华的一次重大胜利，它们通过这一政治贷款，开始控制了中国的重要税收，扩大了在华的政治影响，从而使清朝政府在财政上逐渐丧失了独立，在政治上加深了对外国侵略者的依赖。

在谈判“四厘借款”的同时，沙皇政府还积极筹划在中国设立银行，借以“巩固俄国在华的经济势力，以与英国之既得的优势相对抗”^③。由于沙俄资金不足，故而邀请法国金融资本家参加。法国政府也认为，由于海关掌握在英国人手里，故以海关收入作为抵押并不可靠，必须另外建立一个凌驾于海关之上的组织

①②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30页。

③ 罗曼诺夫著：《帝俄侵略满洲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中译本，第73页。

（如享有特权的银行），才能监督中国还债。这个方案，实际上就是要垄断包括海关、地丁、厘金等在内的中国全部财政收入，排斥英国的在华势力。

在《四厘借款合同》签字的第二天，即一八九五年七月七日，便由财政大臣威特和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亲自出马，向正在圣彼得堡的法国大银行家霍丁盖尔（Hottinguer）、涅茨林（Netslin）、勃里斯（Bris）等洽谈筹建银行问题。威特表示这家银行将由沙皇政府庇护，“在极宽泛的原则之下，在东亚各地进行工作”^①。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他们背着清朝政府，在巴黎俄国大使馆签订了《华俄道胜银行章程》。不久，这个章程便经沙皇批准，道胜银行正式开业。道胜银行的资金为六百万卢布，董事长为曾经陪同尼古拉二世东游的乌赫唐斯基（E.E.Ukhtomsky）。总行设在圣彼得堡，并在中国各地设立分行。道胜银行经沙皇授权，除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外，还可担任“商业、货运、服务于中国国库之任何业务，特别是承包税收与发行货币，在中国境内修筑铁路，并安设电线”^②。所有这些事项，无一不涉及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而俄、法帝国主义居然公开把它们列入道胜银行的业务活动范围之内。

与此同时，法国侵略者还乘机向清朝政府进行了另外的勒索。一八九五年五月八日，法国外长哈洛托（A.A.G.Hanotaux）召见中国驻法公使龚照瑗，正式向他表示：“法和俄、德争退辽东全境”，对华有“功”，要求中国政府就前议商务、界务等事，与法使施阿兰（A.Gérard）商议“通融办法”，早日定议，“以服国人之心”。^③同时，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也迭次亲至总理衙门申言：“此次中日和局，法与各国出为调处，大有益于中国，而法都

①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中译本，第73页。参阅《威特致穆拉维夫函》（1899年1月17日），见（俄国）《财政部档案》第27号。

②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中译本，第73—74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一百一十一卷，第23页。

议院屡诘外部，何以为中国如此出力？故外部急欲订定此约，俾国绅民咸知中国优待法国之意。”^①奕訢等详审法人词意之后表示，法国此举，“虽迹近居功求报，究非无因”；并且认为：“该使臣既奉国命，明求利益。……其可以迁就者，自不得不稍示变通，庶足固邦交而维大局。”^②于是，总理衙门奏请光绪皇帝，“勉从其请，以示酬答之意”^③。旋奉硃批，命由奕劻、徐用仪于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日（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与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签订了《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和《续议界务专条附章》^④，对光绪十二年 and 十三年 的商约作了有利于法国的修订，从而使法国在商务和界务两方面都获得了新的巨大侵略权益。

关于扩大通商特权问题，《续议商务专条附章》第三条规定：中国允将“云南之思茅开为法越通商处所，与龙州、蒙自无异，即照通商各口之例，法国任派领事驻扎”。第二条规定，修订一八八七年《续议商务专条》第二条，将原议允开蛮耗通商之处，“改在河口，法国任在河口驻有蒙自领事官属下一员”。^⑤这样一来，我国西南边省的门户就进一步向法国敞开了。同时，商务专条附章第四条还规定，修改一八八六年《越南边界通商章程》第九款，允在龙州、蒙自、思茅、河口四处之间，经过越南，运销土货，“出此口时，应照十分减四之例收税；到彼口时，免征进口之税”。“由以上四处运土货出口，前往沿海、沿江通商各口，应照十分减四之例收出口税。俟到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应照……同项土货通例，完纳复进口半税”。“凡有沿海、沿江通商口岸运土货，经过越南，前往以上四处，于出口时，征收十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一百一十四卷，第1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一百一十四卷，第1—2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一百一十四卷，第2页。

④ 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1895年6月20日），共计九条；《续议界务专条附章》（1895年6月20日），共计五款。这两个条约的全文，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1—625页。

⑤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2页。

成正税。……进口时，按照十分减四征收复进口半税。”^①经过这种修改，法国获得了通过越南经营我国西南各省和各口岸之间土货贸易的优惠特权。此外，在第五条内还进一步规定：“中国将来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时，可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至越南之铁路或已成者或日后拟添者，彼此议定，可由两国酌商，妥订办法，接至中国境内”^②。这就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侵夺铁路路权和采矿利权开了先例。此约缔结之后，我国云南、广东、广西三省便开始逐渐成为法国侵略者的“势力范围”。

关于重定中越边界问题，《续议界务专条附章》的第三款规定，中国同意将滇边的“猛乌、乌得、化邦哈当贺联盟猛等地各处划归越南”^③，从而对越南，实际上也就是对法国作了领土的割让。这一界约缔结之后，法国政府随即派员前往猛乌进行勘界。由于法国委员“嗜利贪功”，“自到猛乌，苛虐土民”，“甚欲据茶山门户，令收盐井利权”。^④“夷（少数民族人民）情不服”，调集附近各地土弁，“会齐十二板纳夷练（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力争猛乌”。^⑤普洱“道府恐酿事端，即派刁丕文前往弹压，勿得一练入两乌之界”^⑥。

英国政府看到法国又在中国夺取了新的权益，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在华势力，感到十分不安。英国政府认为，中法新约的订立，是对英国在中国西南势力扩张的严重威胁。故于中、法订约的那天，英国公使欧格讷亲自跑到总理衙门吵闹不休，指责清朝政府将猛乌、乌得等地割让法国，违背了一八九四年三月一日中英条约第五条的规定，阻挠中国代表在中法条约上签押。^⑦嗣在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2页。

②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3页。

③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5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第一百一十八卷，第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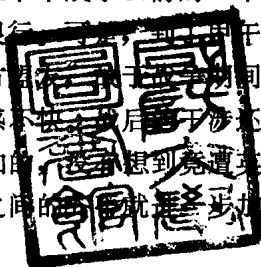
⑤⑥ 《清季外交史料》第一百一十八卷，第7页。

⑦ 施阿兰：《使华记》第64、65、75页。转引自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译本，第132页。

中法条约签字之后，欧格讷又再三向中国政府提出所谓“抗议”，继续施加外交压力，力谋阻止清朝政府批准该约。^①法国公使施阿兰见英国出而梗阻，深恐有变，便连忙挽请俄国公使喀西尼共同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他们声言：中国政府如不批准中法条约，“法国政府方面不能够应允执行所同意的为中国解放它的领土的四亿法郎借款的条款”^②。清朝政府因为急于偿付对日本的第一期赔款，只好批准中法条约，并逐步将其付诸实施。赫德对此颇感愤懑，他满腹牢骚地报怨说：“俄、法两国在此左右大局，为所欲为，别人无说话余地。”^③

二、沙俄诱订《中俄密约》和列强 争夺芦汉铁路路权

俄、法两国所以能够借干涉还辽事件，肆行敲诈勒索，迅速扩大在华侵略势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清朝政府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后对沙俄产生了严重的幻想所致。原来，由于英国是当时列强中最强大的国家，它在对华贸易中占有绝对优势，并且控制着中国的重要税收机构海关，再加上海关总税务司在中国对外事务中的有效活动，所以，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以亲英为主，如在甲午战争以前的二十多次外债，其中的绝大多数就是借自英国银行。可是，到了甲午战争前夕，英国因欲扶植日本作为它的东方盟友，在甲午战争期间采取了袒护日本的态度，是以清朝政府颇感不快。其后在干涉还辽问题，清朝政府原以为英国也会积极参加的，没有想到竟遭英国政府拒绝。这样一来，清朝政府与英国之间的裂痕就进一步加深。



-
- ① 施阿兰：《使华记》，第64、65、75、76页。转引自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译本，第132页。
- ② 施阿兰：《使华记》，第76页。转引自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译本，第132页。
- ③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0页。

而沙俄的出面带头干涉，使辽东半岛失而复得，因而清朝政府对之深为感激。于是，在清朝统治者中一时呈现出浓厚的亲俄气氛。疆臣廷吏纷纷提出实行“联俄”政策的建议。两江总督刘坤一在一八九五年七月八日首先上奏，主张“联俄拒日，以巩陪京，而维大局”。他说：“今日事益棘手，中国刚柔之用，贵随时变通，各国向背之机，在因势利导。……此次与日议和，诸多迁就，益启外人窥伺之渐，虎视眈眈，皆思择肥而噬。我自度力不能及，不可不亟联邦交，以资将伯之助。”东三省为我“龙兴重地，三陵所在，……倘东三省有失，则我朝何以奠根本”。“俄疆宇已广，且信义素敦，……此次与法、德争还辽东，其为德于我更大。”故而，他建议清朝政府，今后“凡与俄国交涉之事务，须曲为维持。有时意见参差，亦复设法弥缝，不使起衅。中俄邦交永固，则日与各国有所顾忌，不至视我蔑如，狡焉思启矣”。^①接着，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在同年八月八日奏称：俄国“举动阔大磊落，亦非西洋可比”，今视其干涉还辽之举，“较之他国袖手旁观，隐图商利，相去远矣”。因而他主张“加以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凡关于俄国商务、界务，酌与通融。如俄国用兵于东方，水师则助其煤粮，准其兵船入我坞修理，陆军则准其假道，供其资粮车马。……与之订约，若中国有事，则俄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并与之议定酬报之法。……此尤邦交之微权，救急之要策也”。^②在京官吏亦有与之呼应者，如仓场侍郎许应骙在七月二十七日的奏折就力陈“昔当联英以拒俄，今则当联俄以拒日”。他说：沙俄“二百年来，与中朝未尝失好，间有齟齬，旋即释嫌。是较他国之肆意要求，动辄恫喝者，似尚有别。即就此次日事而论，归辽南侵地，贷我万万偿款；不

① 刘坤一：《密陈大计联俄拒日以维全局折》（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六日）。见《清季外交史料》第一百一十五卷，第20页。

② 张之洞：《今日救急要策莫如与俄立密约以结强援片》（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见《清季外交史料》第一百一十六卷，第36页。